

西方學者：普世價值不能決定中國的發展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某些所謂的專家學者，竭力推崇在中國推行西方的“普世價值”，似乎只要中國實現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就會解決中國所有的問題，中國的前途就會一片光明。然而，今天，一位西方的著名學者卻給出了完全不一樣的結論。

昨天，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一篇附帶視頻的文章，題為：“沃爾夫：西方眼中最大的‘中國謎題’”，文章中，《金融時報》副主編，首席經濟評論員沃爾夫以一個經濟學家、思想家及媒體人的角度，就西方人眼中的中國、中國模式、以及西方在2016年之後的路徑選擇談了他的看法。在他的言語中，不時顯露出對中國的發展成就、中國政治體制在中國發展中作用的贊嘆，以及對西方民主制度的反思。他的許多觀點無形中對中國某些詆毀中國現體制、竭力推崇西方“民主自由”體制的“專家學者”是一次有力的駁斥。

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英國人，別業於英國諾丁漢大學，劍橋大學聖體學院和牛津經濟政策研究院(Oxonia)院士，諾丁漢大學特約教授，諾丁漢大學文學博士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博士，被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國際時事刊物《外交政策》雜誌評選為全球最重要的100位思想家之一，是公認的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宏觀經濟評論人之一，2000年獲得大英帝國勳爵勳章(CBE)。

沃爾夫在世界頂級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中人脈廣泛，是達沃斯等國際論壇上的常客，支持全球化和自由市場。他多年來密切關注中國經濟，過去25年間幾乎每年都到訪中國。現為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及首席經濟評論員。

一、中國的成功讓中國體制成為西方眼中最大的“中國謎題”

沃爾夫20多年來一直關注中國，親眼見證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對於一個“非常龐大複雜”、“非常古老文明”的中國，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推行現代化，並取得的成果，發出感嘆：“是獨一無二的”。他認為，對於西方來說，最大的“中國謎題”是：“這種現代化進程是由一個共產主義政黨領導的。”

他說：“對我們西方人來說，共產主義是一個非常奇特的意識形態，它來自西方，卻被西方所拒絕。現在共產主義出現在中國，這個文明古國宣稱它是共產主義的，我們很難理解這意味着什麼。這真的可能發生嗎？它又是怎麼運行的？”按照西方的價值觀和標準“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中央集權的，原則上來講顯然是非民主的，但同時中國又有一個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這種奇怪的對比也是獨一無二的。”一個共產主義

國家怎麼會有如此活躍的市場經濟？“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謎題。”

“中國經濟當然有很多特色，其中一點是國家在經濟中的角色。在每一個大企業中都有一個黨組織，這一點很特殊。我們需要搞清楚他們的角色，他們是怎麼工作的，會怎麼影響企業運營。”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共產黨組織在其中起着什麼作用？確實會讓對社會主義體制國家抱有敵視的西方不可思議，成為“中國謎題”

應該是很正常的。因為一向以“民主自由”為傲的資本主義體制國家，在美國引發的“金融風暴”後，一個個走向衰落，而社會主義體制的中國卻蓬蓬日上，快速發展，這不得不讓他們思考。體制上的優劣究竟以什麼為標準？國家的發展、物質及精神的豐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狀態的穩定更能說明問題。

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國家，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黨領導，如果實行所謂的西方“民主自由”的體制，其結果只會是中國成為一盤散沙，四分五裂，戰爭四起，何來真正的民主自由？這些，並非西方不明白，只是他們不願意承認而已。因為，中國若真分裂成無數個國家，經濟衰敗，就證明瞭社會主義體制的徹底失敗，這才是他們要的結果。

因此，沃爾夫如果從這點去分析，也許更能幫助西方破解“中國謎題”。

二、西方的優越感正在消失

西方一貫認為，西方的“民主自由”體制從根本上要比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優越，不論在經濟上、文化上，甚至在種族上，中國無論如何也比不上。可是，近幾十年來中國發展的成功與西方的逐漸衰落，讓這種優越感受到挑戰，甚至在慢慢消失。

因此，沃爾夫說：“美國人肯定覺得他們的經濟文明仍是世界上最優越、最有活力的，但他

們肯定不像三四十年前那樣如此頑固地確信這一點了。西方那種舊時的優越感已經蕩然無存了。”

“我們曾經認為我們西方的政治體制、政治價值是世界的標杆，自由民主是統治世界的最佳方式，但我想發生在過去一兩年間的事情，讓我們對此也提出了疑問。我們肯定犯了一些大錯，才會把美國總統的位置交給了一個完全不勝任的人。這當然會引發疑問：我們的體制還在運轉嗎？而且中國人比我們更有資格問出這個問題。西方的確應該自問，我們是否還有自信的資本。”

雖然，沃爾夫表示，“現在還不能說資本主義和民主失敗了”，但他依然指出了西方存在的致命問題“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失敗在某種意義上是聯繫在一起的，都肇始於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這場危機本不應發生，是政府的金融市場政策失誤所致，凸顯了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而不穩定性是資本主義運轉中的一個重要特質，要靠民主解決這個問題非常困難，至今依然很難。”

沃爾夫上述的分析，也許讓我們更加理解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是腐朽、沒落的”觀點，雖然這是個需要經歷長期、痛苦的瓦解過程。

然而，中國某些專家學者絕對不會認可這個觀點，有不少人質疑“說資本主義是腐朽、沒落的，可為什麼現在它還充滿活力？”“全球為什麼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遠遠多於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筆者認為，持這種觀點的所謂專家學者是有意誤導人們的觀念。一是不承認在社會各階段進程中存在的客觀時間性和各國社會進程的差異性；二是制度優劣的標準不是以存在於國家多少決定的，而是以社會物質發展與人民生活狀況決定的。世界上實行資本主義體制的國家一塌糊塗的還少嗎？另外，憑什麼就認定資本主義就一定都充“滿活力”？

來自西方的沃爾夫之所以對西方的資本主

義民主自由體制發出反思和擔憂，正是因為看到了社會主義中國發展的成就。這點，中國的“推牆派公知”真該認真學學。

三、中國“推牆派公知”享受西方的偏見

人們常見西方媒體對中國報道的抹黑和歪曲，讓人忿忿不平。他們為何要這麼做？

沃爾夫給出了答案：“大部分國際主流媒體的記者是西方人，秉持美國式的自由主義立場，他們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點本能地不喜歡中國的政治體制。”

“我們認為共產主義這種意識形態難以理解和接納。要知道，當年的冷戰，正是一場民主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間的衝突，是意識形態的衝突。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政治體制是西方的對手，人們當然對它有所懷疑。”

沃爾夫的這個解答應該是很實在的，也給我們破解了西方及西方媒體為何對中國有偏見。其實，就是因為你的政治體制我們不喜歡，所以就要“黑”你！

然而，非常奇怪的是，中國的某些人特別享受西方的這種偏見，而且常常將這種偏見用作“推牆”工具，以證明中國政治體制的不好，甚至按照西方的觀念，認為在經濟有了發展後，中國就一定要在政治體制上向西方靠攏。

對此，沃爾夫也給出了答案：“大多數西方人的假設是，隨着中國經濟發展，中國人變得更有錢，出現更多中產階級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中國在政治上可能會變得更像西方。這一過程確實在韓國和日本發生過，但好像還沒有要在中國發生的跡象。”

“幾乎可以肯定，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從而成為世界上居主導地位的政治因素，而中國又不是一個西方式的國家，將來也不會是，這讓西方人感到害怕。西方人已經完全習慣了用他們的方式來統治這個世界，奇怪的是他們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他們不想失去這樣的地位，但很明顯中國將改變這一切。大多數有智識的西方觀察者認為，中國的崛起既令人興奮也令人害怕，因為我們不知道這對我們的世界將意味着什麼。”

沃爾夫的這兩段分析，不僅是對西方的自我認知，更是對中國“推牆派公知”跪舔西方醜態的狠狠打臉。如果無視自己國家所取得成就，對自己的國家不懷有起碼的信任和情感，而將西方的政治制度無知地頂禮膜拜，成天就想着如何將中國現在的政治體制推倒，建立符合西方地政治體制，到頭來只會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華裔教授談亞裔在美國：因優秀遭歧視

美國加州大學黑斯廷斯法學院教授及前任校長兼教務長吳華揚(Frank Wu)是美國著名的社會活動人士，長期為亞裔在美國追求平等權利而發聲。不過，因為3月份撰寫的一篇有關華裔新移民的文章，他飽受爭議。他不久前接受美國之音的專訪，談亞裔、特別是華裔，在美國的地位的變遷。他說，亞裔在美國社會“可見度”(visible)提高了，但是，因為“優秀(superior)”仍然受到歧視。

美國首都華盛頓市中心的東部，有一個規模不太但是歷史悠久的華人街區。這里相對於美國其他城市的“中國城”(唐人街)，街道相對整齊幹淨。雖然街道上還矗立著一座高大的牌坊，上面寫著“中國城”三個大字，但是很多年老低收入的華人已經搬離，相反這里成了首都地區年輕人夜間逗留的繁華去處之一。當然，這里也被認為是美國最沒有中國味的中國城。

吳華揚曾在華盛頓的霍華德大學任教。這是歷史上著名的黑人大學之一，而吳華揚也是這所大學第一位亞裔的教授。他特意選擇華盛頓“中國城”的一家“茶店”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他說，華盛頓的這座中國城是華裔在美國地位變遷的縮影。

他說：“這里基本上沒留下什麼真正中國味的東西了。這是一個殼，一個假中國城。”

“中國城”曾是華裔移民初到美國的落腳地，一直充當著移民的庇護所。但是，現在華盛頓地區的亞裔和華裔都聚居在馬里蘭州的蒙哥馬利郡或是鄰近維吉尼亞州北部的費爾法克斯等地。這兩個地區數年來一直名列全美十大最富有郡縣排行榜。

吳華揚說：“現在的亞裔(華裔)人口是聚集在大城市的郊區。在加州也是這樣，華人聚居的主要地方是蒙特雷公園，距離洛杉磯市九英里的地方。在其他地方也一樣，老舊的中國城讓位給新中國城。”

吳華揚在美國出生和長大，他把自己成長的環境和現在在美國出生的華裔相比，他說：“我70年代在底特律長大，沒有什麼多元化和多種文化，你要做的就是融入。在那里，基本上沒有亞裔人，我們是我們所在社區唯一的東方(Oriental)家庭。這個詞還在用，東方更適用於描述

地毯而不是人，帶有異域風情。Oriental 這個詞還是有些貶義的。雖然比‘中國佬(Chinks)’要好一點，但是總是有一種異域，已經過時的意識在里面。”

他說，與過去相比，現在亞裔的成長環境變了，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亞洲的崛起，特別是中國的崛起。他說，在1940到1970年代，每個人都想來美國，但是現在中國人不再把來到美國當成一種夢想。第二是技術的進步。他說，社交媒體把全世界聯繫起來。來到美國的移民們可以通過社交媒體繼續保持他們自己原來的社區，即便是隔著遙遠的太平洋。第三，亞裔成為美國主流社會的一部分，成為“正常人”。他們出現在美國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經濟、體育和娛樂領域都活躍著亞洲人的身影。第四是亞裔人口越來越多。

亞裔因為“優秀”遭受歧視

吳華揚說，雖然亞裔在美國的成長大環境有了很大的改變，但是，“在美好和禮貌的表面下”，仍有暗流涌動，亞裔仍然會遭遇各種各樣的歧視。

他說：“亞裔受到各種各樣的歧視，有時候我們越成功，就會越有反作用。他們認為我們是在占領。”

吳華揚認為美國一些大學招生中出現限制亞裔學生名額的現象就是一種歧視。2014年，加州旨在尋求提高拉裔和非洲裔入學比例的SCA5提案遭到了很多亞裔人士的強烈關注和極力反對。

吳華揚舉的另外一個例子是美國高校中亞裔擔任領導職位的人數在減少，雖然在高校里擔任教授和高級教授職位的華裔和亞裔並不少。吳華揚本人曾經擔任美國加州大學黑斯廷斯法學院的校長兼教務長，是美國首位擔任這樣職位的亞裔。

他認為，亞裔不僅僅在工作的地方感受到歧視，在生活中也存在歧視。他說：“有時候我走在舊金山的街頭，有人開車路過，突然搖下車窗，叫我‘中國佬’，或是‘滾回到你原來的地方去。’”

他解釋說，這樣的事情雖然不是每天或是每個星期都遇到，但是可以說是每個月都會遇

到。

這樣的遭遇(紐約時報)亞裔主編邁克爾·羅(Michael Luo)也遇到過。他2016年10月在《紐約時報》向一位曾經讓他“滾回中國去!”的女士寫了一封信。在這封信中，他和朋友們走在紐約曼哈頓的街頭，可能因為手推的嬰兒車擋了某位女士的道路，於是遭到了上述的種族侮辱。他強調說，這樣的遭遇應該不是亞裔美國人遭到的唯一的侮辱。

現在同時擔任亞裔精英組織“百人會”會長的吳華揚特別強調，他很愛美國，愛美國的理念、憲法和民權，同時，他也學會了為自己的權益“站起來，大聲地說出來”。

吳華揚在很多場合解釋過自己致力於維護華人權益的原因。1982年6月23日，在密歇根州底特律的高地公園，美籍華裔男子陳果仁(Vincent Chin)被素不相識的兩名白人男子棒殺。法官輕判了這起命案，由此引發了亞裔社區大規模的不滿和抗議，同時也激起了年少的吳華揚從事民權運動的決心。

吳華揚解釋說，現在華裔或是亞裔在美國遭受歧視的原因與1882年《排華法案》通過前的某些理論類似。

他說：“你如果讀讀過去人們的辯論，為什麼他們要把華人排除在外？他們說，中國人工作太努力，這是不公平的競爭。我再說清楚一點，他們是說中國人‘太好了’，不是他們太糟糕，而是‘太好了’。他們的說辭說，這樣，他們會逼走白人工人。”

當年《排華法案》的強烈支持者包括美國工會領袖。美國勞工聯合會創始人塞繆爾·岡帕斯(Samuel Gompers)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排華的一些理由：肉食對大米：美國爺們對亞洲苦力，孰能生存？》(Some Reasons for Chinese Exclusion. Meat vs. Rice. American Manhood Against Asiatic Coolieism. Which Shall Survive?)這篇文章的一個基本論點是：亞洲人吃米，米比肉便宜，所以亞洲人必然會不公平地擊敗美國男子。

吳華揚說，這位工會領袖的基本觀點是，亞洲人能吃苦，願意忍受更惡劣的環境，造成不公平競爭，所以他們應該被排除。他認為，這樣的觀點再次出現。

他說：“亞洲人在競爭中會更厲害。換句話說，他們的論點不是亞洲人太差，而是太優秀，會做得更好。”

吳華揚指出，當時想把中國人趕走的是愛爾蘭裔的白人移民，並非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他們是移民，他們想趕走另外一批移民，因為競爭太激烈。”不過，現在他自己也被別人指責是希望趕走新移民的人。

新移民和老移民的分歧

今年3月，吳華揚在美國自由派媒體《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上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目是：《關於新移民 -- 給美國亞裔活動家的一封信》。他在文章中探討了新華人移民和老一代亞裔美國人在理念上的嚴重分歧，他本意是呼喚老移民們給新移民們空間，不料，文章因為翻譯出現歧義，引起了軒然大波。

吳華揚在文章中說，新的亞裔，“特別是來自中國的移民”，仿佛一夜之間從美國的各個角落冒了出來，從南加州的郊區，到舊金山西邊的各條“大道”上、硅谷、東海岸，還有一些以前從未有過亞洲人面孔的社區，無處不在。

他說，那些“剛下船的人(新移民)”在老華僑們眼里千篇一律的形象是：“珠光寶氣、不排隊、搵鼻子、隨地吐痰、開車不守規矩、被動惡意攻擊的行為，還有，希望他們至少不吃狗肉。”

他還說，新移民在許多問題上和本土亞裔美國人的理念不同，也願意站出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從高等教育多元化，到‘非法’移民、同性戀權利、警察暴力、體罰、死刑等問題，不管你們組織什麼樣的抗議，他們作為亞裔的面孔，他們隨時準備站在你們的對立面。即使在環境問題上，因為他們對魚翅或某種瀕危物種的熱愛，他們認為自己受到了迫害。”

吳華揚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對自己的文章的意思被扭曲感到委屈。他只是致力於在美國華人社群構建交流與溝通橋樑。他說：“我的目的就是搭建橋樑。我確實是在批評一羣人，我是對那些批評新移民的人提出批評，我是站在新移民那邊的，我是說，你們不要再歧視新移民了，你們并不比他們更高級。”